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进入新阶段

——谈《章太炎全集》的出版意义

许嘉璐

太炎先生过世81年了。这81年可大略分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40年。前40年我们经历了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及在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所受到的挫折和颠簸。40年的变化之大，可以用《周易》说的“匪夷所思”形容：天翻地覆啊。在那样一个并没有完全安定的时代，编《章太炎全集》无疑是天方夜谭。后40年，中国渐渐地、越来越明确地走上了自己的道路。《章太炎全集》在这后40年结出了硕果，虽然也经过了很波折，但终于完成了这项了不起的工程。最近十几年，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还有一个优势：太炎先生亲炙弟子和再传弟子在。如果延后十年，整理的难度还要加大许多。让我们永远牢记那些传承章学的前辈。

《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出版，从某个角度，可以说标志着中华民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工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近些年，各级出版单位纷纷重视重著、重译、重印古代著名典籍和本地乡贤著作。这一风气的延伸，就是

更加重视现代学术伟人、革命先驱的论著。谈近代革命，谈中华民国，甚至了解中国共产党，绕开章太炎先生就将是完整的。现在《全集》出版了，这是一个不小的飞跃，也是一个信号。

如果没有《章太炎全集》，我们不但在历史研究和学术传承资料方面茫然不具，更可惜的是对清末民初的革命事业、社会状况、学术水平，是一种短缺或曰空白。《章太炎全集》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

《章太炎全集》的搜集、整理花了40年。这40年里，经济年年增长，城乡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中华民族的民风、官风、社会结构和人的思维却在不断地、激烈地起伏着，曲曲折折向前。这说明我们的时代在转折。出现种种忽视文化只重物质、欣赏技术忘却灵魂的现象，几乎是任何处于转折期的国家都不可避免的命运之坎。编辑、出版《章太炎全集》尤其需要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出版机构能够沉静下来，一字句、一标点、一附注，一再校刊，这是中华民族宁静反思、志存久远精神的体现。

现在出版的《章太炎全集》的水平已经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那8卷。这意味着我们不是仅仅承接和重复前人的工作，而是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站在时代变革的前沿，就必须创新，这正是太炎精神的重要核心。《章太炎全集》从“怀孕”到“养胎”再到“出生”，在众多参与者中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太炎先生的精神。

《章太炎全集》的出版恰逢其时。今年年初，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尤应关注的是里面提到，要“重视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绝学”和“冷门”是学界的常用语，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里，非同小可。太炎先生的学问就是民族绝学的一部分。上世纪30年代，太炎先生在苏州留园定期给公众开讲座，苏州、上海的青年纷纷跑来听讲。此景今日“何处寻”？作为一个被冷落甚至冷落了多年的学者，应该慢慢地热起来。先生创造和传承的绝学，智者应该为“往圣”而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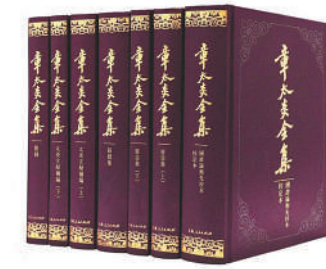
——张横渠的22字“箴言”是完整的一体，“继绝学”是从“为天地立心”到“为万世开太平”的衔接关键。在即将断或已断的学问中，饱含着“往圣”的也就是民族的智慧和精神。太炎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学问和革命就是跨越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精神。历代圣贤，谁不是关注民生、关注国家，而后学有所成？太炎先生一生守护、传承民族之根，他是传递民族精神之火火炬手。

古人常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作为一个时代标志的学者、思想家，同样是500年才能出现一位或几位。从先秦到两汉，从两汉到唐，再从唐到南宋，从南宋到明代中叶，从王阳明再到章太炎，大约都是五六百年。我相信，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在世界变小、步伐加快的时代，也许用不了500年就会有一个时代标志性的“学者+革新者”出现。这一位或一群人物的出现也将有赖于今天的学者好好护着火炬，薪传绝学。

我们已经坐而论道了，如果不能广而告之，起而行之，太炎先生的影响，他这一支薪火就难以有继。既冷

又绝的学问，知道的人少，能深入其中、跳越其外的人更是太少太少。当代在金钱、地位种种世俗生活压力和引力下的年轻人，能像当年到留园听太炎先生讲演的，全国不知有几？

让太炎先生重新热起来，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是时代转折中的艰难，也是文化沉沦多年又抬头再起时的必然。但是，中华文化的特点就是生生不息，日日新、又日新。回顾80年来中国的变化，看看今天的世界风云起伏，应该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会继续努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包括太炎先生的精神，传承有人，腾飞有望！



序与跋

琢磨不透的《寓言》

陶冶 林斌

提到威廉·福克纳的作品，书评界普遍有这样的说法：

如果读者想要接触到诙谐轻松、平易近人的福克纳，那他该试试《我弥留之际》；要想寻求侦探小说般的新鲜刺激感，可以去读《圣殿》来读；假如想读有一定难度却能令人收获颇丰的福克纳，那就要把《喧哗与骚动》推荐给他；倘若要选出福克纳一生中最为伟大的作品，那该是《押沙龙，押沙龙！》；万一人追求的是阅读难度和挫败感的刺激，那就试着读一读《寓言》吧。

最后一点虽为笑谈，却也不失真实性：这部以战争为背景和题材的作品的确是让全世界的读者贴上了晦涩难懂的标签，几乎将其打入了冷宫。

《寓言》是福克纳最难懂的一本书，也是他篇幅最长、叙事最宏大、人物最多、写得最为辛苦的小说，从构思到完稿断断续续花了十来年的时间，甚至为了提醒自己小说的脉络还把大纲写到书房的墙上。

小说发表以后，他得了两个大奖——1955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然而当时的书评都是批评多于赞扬。评论者从结构、主题、手法等各方面加以批评，认为小说杂乱无章，难以理解。即便是大批评家，在肯定小说有“极具震撼力的场景”“雄心勃勃的构思”等优点的同时，总还是会提出一些不足之处。最严厉的是著名诗人、小说家和新批评理论派的主将罗伯特·佩·沃伦。他直截了当地说，小说是“巨大的失败，也是极其令人厌烦的一本书……其构思混乱不堪，实现这些构思的过程也混乱不堪”。

有意思的是，福克纳自己却认为《寓言》是他的“杰作”，在他的书信里面几次称之为他的“史诗”，乃至他的《战争与和平》。即便在他自我怀疑的时刻也表示，这是一个宏大的想法，而自己又一直离它太远，“这就像是近距离站在一头大象身边；过了一阵子，你就根本看不见这头大象的全貌了。”他希望通过小说告诉人们那些在他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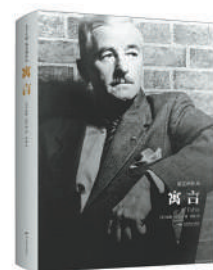
借用评论家的话说，《寓言》讲述了一个关于基督第二次降临、竟然降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中的含糊不清的寓言故事”。那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军战壕里的为期一周的“兵变”事件。1918年春天，星期一上午9点钟，法军前线某军团的3000名士兵在一名下士领导的12个普通列兵的影响下集体拒绝进攻，使得对阵的德军也暂时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当天下午3点以后，西线战事随之全部沉寂。对阵双方的高层将领经过紧急密谈，竟然下令朝手无寸铁的士兵们开火，并当众处决了引发兵变的那名下士，同时也将力主惩罚全团士兵的一位师长秘密杀害。这样一来，这场战争便得以继续下去。小说详叙了法、英、美三国军队将领如何着手调查此事，与德军高层秘密会晤，想方设法掩盖真相，神不知鬼不觉地惩处兵变者，通过暗箱操作让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全过程。

这样一本令人琢磨不透的小说，对于翻译也是一种挑战。做过翻译的人都知道，出色的译文首先需要对原文的正确理解，其次是用精确的文字完美地表现原文的含义。用当年朱光潜先生的话说，就是“不仅要把握字面上的意思，还要把字里行间，甚至字背后的意思都传达出来”。福克纳在诺贝尔奖致辞中说，作家有义务“通过提升人类的心灵，提醒他们牢记勇敢、荣誉、希望、尊严和同情这些昔日的光荣，来帮助人类生存下去，这是作家的荣幸”，同样的，译者也有义务帮助读者跨越语言隔阂，捕捉到这些超越时空、属于全人类的“洞见”，分享并传承人类思想的宝藏。作品出版于1954年，过了半个多世纪居然无人问津，其难度和冷僻可想而知。幸而，如今这项艰巨的任务终得完成。

《寓言》中文译本的面世，还可能对我们的福克纳研究起促进作用。迄今为止，中国对福克纳的翻译和研究仍然局限于他所构建的约克纳帕塔法王国，对他的非南方背景和主题的作品，无论长、短篇小说都很少研究，甚至可以说还没有触及。但在美国和其他地区，福克纳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扩充范围，探讨新问题，使用新理论，对于《寓言》也有了更多新看法，不再强调这是他“江郎才尽”的表现。有学者认为，福克纳写《寓言》就是要推翻把他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的马尔科姆·考利替他总结的“约克纳帕塔法神话王国理论”。

今年是福克纳诞辰120年。我们真心希望，随着《寓言》中文版的问世，我国的福克纳研究能够出现新气象。

(本文根据序言及译者手记综合整理)



《寓言》：(美)威廉·福克纳著，林斌译，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才女李清照的被接受史

闻白

在谈到《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本书之前，说实话，我真的没有考虑过为什么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女词人是李清照。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在当下中国，但凡有点儿文化的人，谁还会不会背几首她的代表作，感时伤怀时谁还不顺手引用她的一些名句，况且还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样的铿锵之音。

据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统计，“公元一世纪开始，两千年中华大地上一共出现二十九位著名女作家”，这些“著名女作家”多是业余作家，她们的少数作品之所以能留下来，仅为“聊备一格”，只有李清照的作品进入了史书，出版了诗集，代表了“婉约派”，实现了经典化。

虽然李清照的文坛地位如此独特，不过中国大众似乎并没有产生疑问，也少有人去对李清照的大多数作品进行真伪判断，大多数研究文章是人云亦云的重复。

比如我们特别欣赏的《金石录后序》，“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余性偶强

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李清照在文中所展示的美好追忆让我们无限神往，故而随后所记的“连舳渡江之书散为云烟”的现实伤感以及“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的感喟才更让人扼腕痛惜。

而在作者艾朗诺眼中，这篇《金石录后序》很可能是李清照在经历了失败的再婚后，为重塑自己形象而进行的一次努力。

在对待李清照再嫁及离婚这件事上，宋人的态度是极端的，讥讽和非议铺天盖地。这使她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境地。如何化解，艾著认为李清照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通过撰写《后序》，她不但重塑了自己的形象，再次确立自己作为有才华的文人的身份，也重获皇室肯定，恢复了先前的地位与尊严。虽然文中所营造的与赵明诚夫妇唱随、情投意合、天生一对的夫妻形象受到了质疑，但她却在赵氏猝然离世后，全力保护其所珍

视的收藏的不易依然让人感动，她用文学的语言委婉地解释了自己只身一人，在病痛、困惑、求婚者的欺瞒与弟弟的催促下再嫁的无奈，由此希望世人淡化对这件事的看法。

当然，艾著的解读在我们看来，会觉得依然隔了一层。不过艾朗诺对于李清照从一开始就把自己与其他女性写作区别开来的观点我是赞同的。在当时，有的歌妓会写词，上流社会的女性也有一些作品，但这并不是她们生活中要紧的事情，而且这些作品并不希望被别人看到，只是内部传阅或者闺阁趣味。李清照不一样，她把文学创作视为生活中最要紧的事情。用今天的话说，她对于自己创作者的身份是有自信与自觉的。她有同男性作家试比高下的才情，也有流传后世的理想。

当时的评论者虽然承认李清照的创作有自己的特色，但喜欢她诗词的男性文人在评定她的才华时，总是不免要强调一下：可惜是个女子啊，可惜写的都是闺阁小事呀，可惜她名节有欠缺啊！比如宋代王灼的笔记就很有代表性，既赞许她“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

“我怎么成了布罗代尔的中文译者”

顾良

日前，商务印书馆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下简称《物质文明》)十套样书，送到我家。书籍的封面、版式、插图等设计极其精美，令人爱不释手。编辑希望我用讲故事的方式，告诉大家译书的经过及其中的艰辛。盛情难却，我想，不妨讲述一下自己成为布罗代尔中文译者的前因后果。

我退休前在中央编译局，本职工作是把中央领导人的著作及两会文件翻译成法文，按说很难与外国史学家发生任何交集。然而，太多的机缘巧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事情要从1978年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待法国的一个学者代表团，邀我充当陪同翻译。以布罗代尔为首的年鉴派史学是法国学界的骄傲，代表团自然津津乐道地详加介绍。在他们所做的学术报告里，我第一次听到布罗代尔的大名，并得知“文明史”“长时段”“跨学科研究”等新概念。为了把报告中那些陌生的东西翻译清楚，我不得不请报告人在每场报告前专门为我开点小灶。这点“特殊待遇”，让我打开了新视野。但在当时，这些知识与我的本职工作毕竟相距甚远，我并没有作进一步探究的意图和动力。

出人意料的是，代表团副团长雅

克·勒高夫对我产生了兴趣，主动邀请我去由他担任院长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就这样，经编译局同意，我于1982年11月至1983年7月在巴黎进修了9个月。

法方的邀请意图与我的个人愿望有一定的错位。他们可能希望我在高等研究院能与法国学者有更多交流，加深对年鉴派史学的了解。而我当时却一心想提高法语写作能力，以期回国后做好本职工作。

此外，赴法前我已出版了两本译著：布朗基的《祖国在危急中》和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有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资料，研究动态自然也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因此，9个月中，我对年鉴派史学只给予了有限的关注。认真攻读的两本书至今记忆犹新：勒高夫的《新史学》和孚雷的《史学作坊》。两位作者都是布罗代尔最具影响力的门生，我有幸受到他们的多次宴请。然而说来惭愧，布罗代尔本人的大作，我一本也没有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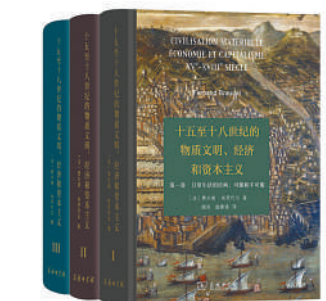
与布罗代尔唯一的一次见面，要归功于《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地区》(以下简称《地中海》)的译者唐家龙先生。一天在巴黎街头偶遇，他正寻找门路，想向作者当面请教几个问题。我利用自己访问

学者的身份，预约了与布罗代尔的会见。可是，我为老唐作了引见后便匆匆告别，并没有参与谈话。领略大师风采的一次极好机会不经意间被我错过，今天回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

与布罗代尔真正结缘，要等到他去世之后的1986年2月。北京三联书店决定出版《物质文明》中译本，邀约施康强和我承担翻译工作。我们感到相当突然，甚至有点胆怯，因为早听说过布罗代尔作品的广征博引和艰涩难懂，深怕三大本巨著落在我们手里成了烫手山芋。可是，在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的巧言游说下，又禁不住书中精美插图的诱惑，我们居然皱着眉头领受了任务。

而法国人文科学之家为促进其创始人布罗代尔的著作在国外传播，可谓不遗余力。这家学术基金会特拨经费，邀请施康强、我和夫人张慧君在巴黎逗留半年，以便我们能就近查阅资料和答疑解惑。基金会主任给我们签发了通用借书证，可以在巴黎所有图书馆和博物馆畅行无阻。

布罗代尔的夫人保尔·布罗代尔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她的帮助也最直接、最宝贵。她把丈夫生前的工作室腾出来，供我和张慧君居住。除了耐心解答问题外，还经常讲些她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趣闻逸事。更加难得的



是，我可以随时查阅布罗代尔在法兰西公学讲课的教案。为了讲课需要，他在教案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正式出版物中让人费解的语句和段落讲得一清二楚。

通过翻译布罗代尔著作的磨练，我的中译法水平迈上了一个重要台阶。在1990年把《物质文明》译稿交齐后，我没有停下脚步。1991年，应商务印书馆邀请为《地中海》第一卷译稿作通读校订；1992—1994年，与张泽乾合作翻译《法兰西的特性》1—3卷；1995—1996年，和张慧君一起编译译史文集《资本主义论丛》。

就这样，十年时间里，我把这位史学大师的主要著作几乎摸了个遍，用布罗代尔夫人的话来说，我可以“当之无愧”地自称是“布罗代尔的中文译者”。这十年的日日夜夜是我翻译人生中最辛苦、最充实和最富成果的金色岁月。今天回顾二三十年前的往事，看到布罗代尔的著作因获得中国读者的欢迎而再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新书架 新书架



《倾听喜马拉雅生长的声音》：吴冰著，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录了一百余首关于西藏的诗，作者曾作为援藏干部在此生活多年，以质朴的语言、崭新的意象描写了这片土地的风貌与藏民生活，充满社会与人文关怀。



《罗曼诺夫皇朝》：(英)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著，陆大鹏译，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以小说笔法写成的扣人心弦的编年史。作者试图以丰富的细节来揭示：哀鸿遍野、战火纷飞的俄国，如何在罗曼诺夫皇朝统治的三百多年间成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俄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染》：文珍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本书为作者最新的小说集，收录了七篇近年发表于《十月》《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的作品。成长是七篇小说共同的主题。作者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出色的个人风格，如浮雕般呈现了当代都市普通年轻人的群像。

读书